

宗族、地域與英雄史詩

閩南歷史文化考察雜記

黃向春

廈門大學歷史大系

2000年8月22至25日，我參加了一次短期的閩南歷史文化考察，考察隊由來自香港科技大學、臺灣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江西師範大學、南昌大學等學校的師生組成。這是我第二次參加這類學術考察活動，第一次是1999暑假期間以「化內與化外」為主題的江西歷史文化考察。這一系列看似零散的學術考察活動的背後，實際上有一個相當有計劃的、事關宏旨的設想——一方面通過考察，讓長期在閩、粵、贛、港、臺從事華南社會歷史研究的師長同行們相互進入對方的「點」，體驗對方的體驗，以獲得和調校更大時空範圍的歷史感；另一方面，通過考察為我們這些即將步入這行列的碩、博士研究生們提供更多接觸田野的機會，增強我們的學術感知能力，培養問題意識。這次考察的地區位於泉州市所屬的南安縣和晉江市，是泉州灣與圍頭澳之間的半島，考察的具體地點石井鎮、安海鎮、陳埭鎮以及龍湖鎮的衙口、錫坑散佈於這一半島的南、北、東三面周邊沿海。實際上這地區只是本次考察範圍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在臺灣。由於我無法隨隊赴臺完成全部考察，因此從考察中得來的感受也就難以完全與考察的主旨相呼應。有意思的是，正是因為我事先並不知道本次考察的主題「閩臺主佃關係比較」，這反而讓我在「部分」中獲得了自己的「完整」感。

（一）南安縣石井鎮鄭成功紀念館

22日上午，我們來到了民族英雄鄭成功的故鄉南安縣石井鎮。石井位於圍頭澳的西北岸，石井江的人海口，與晉江東石隔江相望。實際上石井江是一個狹長的內海，其最內端即為著名的古港安海，石井則位於最外端，緊扼內、外海的連接關口。當我們拾階登上依山而建的鄭成功紀念館，感歎「無歷史可看」時，回頭望去，一片寬闊的港灣盡收眼底，才猛然間感悟到了一種歷史的深度。儘管由於泥沙淤積、灘塗盡現，但仍是帆檣雲集，明

末鄭氏經營時期的盛況可以想見。歷來對鄭成功的研究多關注其收復臺灣、抗擊滿清的英雄事迹和愛國主義精神，而對鄭氏家族史及其與閩東南沿海社會歷史變遷的關係卻少有論及，因而我們只能從中看到一部「傳唱至今」的「英雄史詩」，而無法獲知造就這部「史詩」的更深一層的地域社會歷史背景與動因，也難以深刻理解這部「史詩」在不同政治文化情境中的不同表述。站在現代紀念館的現代碑銘前，我仍能感受到歷史的氛圍，因為我看到了一部「史詩」的現代版本。據已故莊為璣教授的研究，石井與東石、安海，以及圍頭澳的金井、圍頭，深滬灣的深滬、永寧，泉州灣的洛陽、後渚、石湖，都是古「泉州港」的組成部分，這些港口的興衰與性質的變化經歷了一個跨越宋元明清四朝的地域社會及其與國家關係的變遷過程。宋元泉州港以後渚為中心，享「東方第一大港」之譽；入明後，海外交通中心北移福州，泉州官商沒落，安海取代後渚，成為私人海上貿易中心；明末清初，幾經海禁、遷界，安海被毀，海上交通中心南移至漳州月港，安海雖已衰落，但私商仍繼續存在，並保持着相當的活力。何喬遠《閩書》載：「安平一鎮，在郡東南，頻於海上，人戶且十餘萬……多服賈南京、齊汴、吳越、嶺以外，航海貿諸夷，致其財力，相生泉一郡人。」鄭氏家族正是在這背景下譜寫他們的「英雄史詩」的。在這遠離王朝權力中心的帝國邊陲，地域社會的發展變遷在很大程度上始終遵循着自身的傳統與邏輯，在國家力量向邊陲滲透和沿海邊鄙之民習得國家象徵與認同的互動合力下，地域傳統不是被徹底改變，而是不斷變換其存在與表達的方式（這讓人想起傅依凌先生的中國傳統社會「彈性」說）。東南沿海地域傳統的形成與社會文化網路的締結恐怕與內地有很大的差別，以海洋為中心的「經濟圈」也形成既久，儘管不同時代的「經濟圈」有不同的中心與覆蓋範圍。長期以來，這一帶居民的時商時盜、或居或遷、遇強制羈

管則遁迹海外的狀況，始終被歷代王朝視為一種潛在的威脅；東南沿海成爲僑鄉密佈之地，恐怕也很難單純用「人口壓力」、「土地兼併」等因素來加以解釋，而鄭氏家族正是利用了這地域社會的文化資源才得以建立起他們的「海上王國」。由此我想到，如果換一個角度，不從「民族」、「國家」着眼，而是從地域社會史背景中鄭芝龍、鄭成功的「個人生活史」的角度考慮，我們又能書寫出怎樣一個版本的「英雄史詩」呢？

（二）同安縣馬巷「池府王爺廟」

說到鄭成功，不免讓我想起池王爺廟。這種聯想當然是受到某些歷史研究者對池王爺的某種解說的影響所致，而並不是說這兩者間存在着必然的聯繫。在去石井的路上，我們順便去了一趟同安縣的馬巷鎮，去馬巷的目標很明確——去看看那裏的一座遠近聞名的池府王爺廟「元威殿」。王爺信仰是閩南和臺灣極盛的民間俗神崇拜之一，其中尤以泉州地區爲最，據粗略估計，王爺在民間被祀諸神中僅次於福德正神（土地公）而位居第二，不同王爺不同姓氏的複雜多變也非其他諸神可比。馬巷元威殿創建於明末，主祀池王爺，配祀境主公和注生娘娘，經乾隆29年（1764）和民國6年（1917）兩次重修，當地人稱之爲「池府開基祖廟」，俗稱「正爐」。方志中最早關於此廟的記載出現於民國18年（1929）《同安縣誌》：「（元威堂）在五甲街，相傳神爲武進士，池姓，於耆老夢中得之。後現像里社，鄉人鳩衆建廟，遇有疾疫，禱告甚靈，時稱池王爺。」同書中還有與之相關的「請王」（送王船）習俗的記載。這些記載雖然簡略，但也傳達出某些有意義的資訊。一是神爲「武進士」，後又被加上「文中舉人」，並爲之創造出一個清官以己之身獨吞瘟疫、拯救黎民百姓並化身馬巷的故事，雖未得到人間天子的認可，但卻有天上玉帝的敕封，這無疑是要強調池王爺來歷的正當性和正統性；二是「耆老」和「里社」，這似乎表明神廟的創建與某些特定的人和特定的地域紐帶有關。此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神的傳說及其來龍去脈還與一位名叫陳於庭的人關係密切，由於他與池王爺的特殊關係，池王爺的「履歷」即由他敘述而來，五甲紳耆也是據此多方收集資料，才寫下了池王爺的「歷史淵源」，由此可見，在建廟之初陳於庭擁有對池王爺

的解釋權。至於陳於庭爲何許人及其與池王爺（廟）究竟有何關係，恐怕是弄清楚這座廟的來歷及其與所在社區關係的一條有價值的線索。關於王爺到底爲何方神聖，歷來有兩種說法，一說王爺屬瘟神系統，「送王船」即爲送瘟神；另一說王爺信仰源於鄭成功身後民間的立廟祭拜，池王爺即爲鄭成功，「送王船」則源於臺灣民衆送鄭成功靈柩遷葬原鄉的象徵性儀式。蔡相輝先生曾以後一種觀點對臺灣的王爺信仰做過詳細的考證和論述。這種追根溯源、力圖尋找「神話的原型」的做法自然有其意義，池王爺也許的確與鄭成功有關，但對神話、神廟及其儀式的研究顯然不能僅限於此，把一個神從具體的時空情境中、從具體的社區生活史中抽取出來，「化約」爲某一個「原型」的做法，並無助於我們深刻理解他對於一個地域社會及其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意義。鄉民們恐怕不會去追問池王爺究竟是誰，也不是因爲他是鄭成功我們研究者來說，重要的不是與那些「鄉紳耆老」們一樣去爲神尋找一個存在的根據，而是要去追問圍繞神或者廟而展開的一整套完整的社會生活，並揭示內在於其中的各種社會關係及其歷史變遷。

（三）晉江陳棣丁氏家族

22日下午，我們來到了晉江市陳埭鎮著名的丁氏回族的聚居區。「陳埭丁」與隔洛陽江相望的惠安縣「百崎郭」歷來被認爲是中國東部回族的代表。丁氏回族主要居住在陳埭鎮中部的江頭、溪邊、西阪、岸兜、平頭、四境、花廳口7個村，人口近2萬，我們考察的是丁氏宗祠和清真寺的所在地岸兜村。丁氏宗祠位於岸兜村的東南角，祠堂左右兩側迴廊已被闢爲丁氏回族史迹陳列館，中廳與前、後廳及左右廊廡平行分離，總體佈局呈「回」字狀，帶我們參觀的族中耆老特別強調了這一「回」字狀建築佈局的與衆不同及其象徵意義，還饒有意趣地介紹了懸於堂內的「百代瞻依」、「綏我思成」等題匾與被奉爲丁氏得姓始祖的元代名臣賽典赤·瞻思丁的微妙聯繫；由於當地回教徒僅此族人，因此與祠堂僅一牆之隔的陳埭清真寺，幾乎就是丁氏本族內部的寺廟，幾年前他們曾特地從西北某地請來一位阿訇主持寺務，並選派本族優秀子弟去國外學習阿拉伯文。不管這一切是否真的是那麼「真實」，它都給我們留下了一個非常強烈的印

象——丁氏族人作為回族的「族性」(ethnicity)正被刻意彰顯，他們正在以各種歷史和現實的資源創造一個「回族」的認同。由此我想到，丁氏既作為一個宗族又作為一個「族群」，其「歷史」是如何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情境下被建構的？其「族性」的表達在一個長時段的歷史時期（從宋元之際到民國以至現當代）是否經歷了強弱起伏的變化？這一變化又反映了怎樣一個地域社會的變遷過程？總體上說，丁氏回族的歷史就是不斷被「漢化」的歷史，對此「漢化」的過程，鄭振滿教授曾作過精彩的論述。丁氏一世祖丁謹於宋元之際因經商由杭州遷居泉州，由於當時泉州港獨特的社會背景，加之經商的職業，丁氏由漢人歸依回教而成為回教徒也未可知。果真如此的話，僅以「漢化」就難以概括丁氏的歷史了，當然這只是猜測。丁氏四世祖丁仁庵於元末明初由泉州南門文山裏遷居陳埭並棄商從農，這一轉變恐怕多與泉州港的衰落有關，是丁氏應時事之變所做出的生計調整。從宋元一直到明中葉之前，沒有資料可以顯示丁氏族人有任何形式的「族性」表達，他們與其他當地人共同開發經營陳埭，並逐漸積累財產，為成為一方大族奠定了基礎。傳至第七世、八世（成化、弘治間）時，丁氏開始有「漢化」的跡象出現，而全面加速的「漢化」則在嘉靖、萬曆年間展開。鄭振滿教授對此的說明是：在此期間，丁氏的士紳階層獲得了對宗族事務的支配權，並在宗族內部大力推行儒家傳統的綱常禮教，促成了丁氏族人的漢化。在這層因素背後，我們也許還能勾勒出一個更大的背景，如倭亂之後的地方社會秩序重建、丁氏對海蕩的經營等，而在十世丁衍夏（生活於正德—萬曆年間）所撰的一系列家族文獻中，我們還能找到一些關於其「漢化」過程的頗有價值的、也更具體的線索。丁衍夏無疑是丁氏「漢化」過程的親歷者，同時也是這段歷史的記錄者、評論者和解釋者，在其《纂述世謨》、《感記舊聞》、《聚族說》、《祖教說》、《雪戍說》等傳世文獻中，似乎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與丁氏族人在嘉、萬年間發生「漢化」密切相關的歷史情節：成化間丁氏族內發生「爭財之訟」，「裏猾」曾細養求賄不得，遂誣稱丁氏本姓撒，為脫河南彰德衛戍而改姓丁。因當時「所司版籍壞」，加之丁氏「故藏占籍帖莫符」，爭訟長達 18 年而不決。這一事件對丁氏打擊甚大，以致「所遺祭田蕩盡，繼斂

私資以充，而家為窘」，祖墳也被墳丁所侵。後經族人親赴南京「求揭始占籍之版」，才最終獲致清白。正是這一表面上看似僅為「勝國戍」與「我朝民」之戶籍之爭的事件，極大地推動了丁氏的「漢化」進程。七世丁養靜（生活於正統—嘉靖間），因「栗栗於撒氏戍卒之誣」，才「過聽曾社師，援丁度而祖之，以昭其裔不出於回回也」。撒氏屬「勝國」蒙古族遺裔，因此曾姓「裏猾」誣丁氏為撒氏恐怕是有所用心的，也並非空穴來風，我們也許可以據此認為丁氏的「族性」在當時已經有所表現，並已對地方社會關係的締結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由此我們也看到了「戶籍」與「族群」之間另一種形式的微妙關係。

丁氏歷史讓人感興趣的另一方面是其在明、清及民國時期對海蕩的經營。據族譜記載，丁氏蕩產在康熙年間即有 2,000 餘畝，最多時其範圍覆蓋了晉江人海口南岸的大半個泉州灣，從保存至今的民國時期的《敦朴小宗海蕩抽分圖》可窺其一斑。丁氏族人如何在如此長的一段時期內不斷積累財富、取得大片海蕩的控制權？這與其宗族的建設及相應的「文化創造」有何內在的關聯？丁氏在這一過程中與區域內其他的宗族或族群又發生了怎樣的互動關係？與珠江三角洲沙灣何氏相比，陳埭丁氏的發家史有何特點？除了海蕩與沙田的經營本身所具有的差異性外，為何陳埭的「族群」問題遠不如在沙灣那樣顯得敏感、富有變化並具有象徵意義？這些無疑都是值得進一步深究的問題。

（四）蘇棣張士箱家族

與丁氏毗鄰而居的湖中村蘇棣張士箱家族，以及龍湖鎮的衙口施家和錫坑吳家，是本次考察的另幾個重要物件。蘇棣張氏為我們提供了與陳埭丁氏很不相同的另一種家族發展模式，張士箱於康熙間渡臺，率諸子在泉臺兩地創下龐大基業，使張氏成為臺灣早期開發史上的著名家族。由於張氏有清一代均未在臺建立分祠而被視為遷臺「不脫離型」家族的典型代表，加之自己對張氏在臺的開發經營史不甚瞭解，所以在考察中我更關注其祖居地蘇棣作為一個「社區」的意義。儘管我們在短短數小時內無法弄清張史在蘇棣與其他家族的關係，但能明顯感覺到這一社區與遷臺張氏密不可分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在臺張氏是這一社區在臺灣的跨時

空延伸，或者說張氏在臺的開發經營史本身就是這一社區史的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蘇隸的社區史也許可以為傳統的社區研究提供有價值的補充。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是，一般的敘述給人的印象是張士箱之後張氏家族的發展是順理成章的，並成為當地的實力豪族；而在收錄於《張士箱家族文件彙編》一書的一批碑記中可以發現，即使在張家最為鼎盛的乾隆年間，其家族建設以及地方社會關係的締結過程也遠非想像中那麼簡單和一帆風順。如《鑿湖張氏祠堂碑記》提到的宗祠分而後合的艱難，《碩庵公小宗祠碑記》提到的祠堂被後嗣子姓占為居所，《分岱公捐建祀田記》提到的祠堂蒸償入不敷出、輒形細支，《仰山公小宗祠記》提到的在祖地建祠過程中所遭遇的裏中他姓橫加阻撓、退徙新湖、受欺受辱以及對後輩子孫把祠堂化公為私的擔憂等等。這些情況多少表明，張氏在祖居地的發展和宗族建設經歷了相當複雜而艱辛的過程，起碼在乾隆之時，其族內關係和在社區中的地位都遠未得到穩固，這恐怕也是張氏長期未在臺建祠分派而集中力量經營原鄉宗族組織的重要原因之一。衙口和錫坑位於深滬灣的西岸，衙口是明清閩南另一著名人物施琅的故里，之所以把衙口和錫坑聯在一起看，是因為在泉臺兩地錫坑吳氏都是施氏的佃戶，而兩地主佃關係的比較則是本次考察所要關注的主要問題之一。由於我對此類問題較為陌生，又無法赴臺考察而作比較，所以難以形成自己的看法。不過在討論中一些問題的提出，如主佃關係是否具有身份之別的意義、清初時某些特權的獲得對施氏的家族建設及其在地方社會權力結構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何影響等等，對開拓自己的思路也頗有啟發。

（五）小結

在整個考察過程中，我一直都在追問一個問題：為甚麼要選擇這些點作為考察對象？這些點對於我們想要瞭解的「閩南」地域社會的歷史與文化有何「結構」的或「過程」的意義？儘管我們所看到的都是些歷史的和文化的「碎片」，但我想，考察活動的目標設計一定不僅僅只是讓我們關注於某個家族、村落或寺廟，在短短的幾天之內也無法對某個具體物事有深入的瞭解，而我們可以追問也應

該追問的則是這些具體物事背後所包含的某種內在的關聯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以之為線索把那些「碎片」串成一個有整體意義的歷史感。這區域最為重要的地域文化特徵恐怕就是與海洋的關係。無論是石井鄭氏、衙口施氏，還是陳埭丁氏以及王爺信仰等，都與海密切相關。區域內的幾個海灣泉州灣、深滬灣、圍頭灣以及廈門灣長期以來都是本區域歷史展開所依賴的主要舞臺，它們作為地域社會經濟文化活動的中心及其中心地位的更替（宋元時期的泉州灣，明代的圍頭灣、深滬灣，清代的廈門灣），是否可以作為我們對其獲得整體歷史感的線索之一？這一帶在明清之際所經歷的一系列歷史事件，如倭患、海盜、海禁、遷界、復界以及向外移民等等，無疑對當地的社會文化變遷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而這些變遷一方面與當時整個國家的變化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是其內在的社會文化動因使然。深滬灣東北面的永甯鎮，原為明初名臣周德興「經略海疆」時築城水澳而建成的永甯衛，其所轄左、右、中、前、後5千戶所的駐防範圍覆蓋了從泉州灣到廈門灣的整個閩南沿海出海口，這舉措已經預示了一個地域社會發生重大變遷的開始。儘管這些沿海港口衛所設立的理由主要是「防外」，但這一帶長期存在的民衆「時商時盜」、「時民時倭」、「時居時遷」的複雜狀況，使得在「內」與「外」之間始終難以作出明確的劃分，而「內」、「外」界線的模糊又反過來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這一帶民間的「國家認同」達成的進程與方式。與此相關的是，如果從社會生活的層面看，我們不難發現這一帶民衆日常生活所體現出來的靈活性與能动性，包括生計的選擇、神和地域認同的創造以及在田野中最易看到的祠堂規制的變化不一等，對此的理解和解釋恐怕仍然要回到地域的傳統與邏輯中去，而不是單單一個「正統——非正統」的框架所能涵蓋的。由此我聯想到了濱下武志教授所提出的「亞洲貿易圈」，雖然這只是一個關於傳統經濟網路的概念，但其「從亞洲內部思考」的主張無疑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值得參考和借鑒的角度。在這角度之下，再回頭看看那幾部在閩南書寫的「英雄史詩」，也許我們會發現，原來遠遠不是只有鄭成功和施琅才是「史詩」中的「英雄」。